

## 疫 情 同 仇

湖北之外  
疫情最重地市  
温州战疫观察（上）

编者按：

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、感染范围最广、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。

今天，我们将目光投向浙江温州。这里是湖北省外，国内确诊病例人数持续位居首位的地市。

我们以普通人物为视角，见证并记录下，这座城市的人民果敢坚毅、共克时艰的故事。

在过去的两个月里，这绝不是温州人才有的经历。全国人民抗战的战斗历程，注定写入中华民族的历史，也必定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。

▶温州基层工作者恪尽职守、严格把关。黄瀚摄



还没经过权威检测，但科室里的其他病人已全部腾空转移。领导让我们做好收拾各项准备。

我和同事们立马忙活起来。我先给科室里的护士做培训——这个病有什么特点，诊疗时要注意什么，跟她们一一交代清楚。科室里的年轻人，有不少30岁不到。我问他们，你们怕不怕？

没有一个人退缩，他们几乎异口同声：“说上就上！”

除了特别感动外，作为传染病专职医生，我们责无旁贷，一定要上。但旋即，又被一种莫名的忐忑不安包围——

这毕竟是一种未知的病毒。

我们这些第一批冲锋的“战士”，究竟会面临什么呢？

等到晚上六点多，病人杨先生和他的妻子，终于被救护车送了上来。

我第一眼看到病人的时候，有两个印象：第一，病人看上去气色不错。自己走到了诊疗室，让我松了一口气；第二是他的神情特别严肃。

来不及多想，我上前询问病史，带他做各种检查。作为我们院的第一例病例，17个人的团队围着他“团团转”。各种设备应上的都上了，观察护理、营养支持、心理疏导全方面进行。

这个病人长期居住武汉市汉阳区。今年1月3日他从武汉自驾回到温州，1月4日出现了发热症状。不过他的病情恢复总体比较“争气”。一开始胸部CT照出来有些严重，后来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到了第七天的时候，核酸检测两次呈阴性，影像学、体温检查均正常，病人顺利出院。

在治疗过程中，我发现这个杨先生并不“严肃”。他出院之后第一次来医院复查，还跟医生开起了玩笑。

患者的生活原本是春光明媚的，新冠病毒的侵袭，让他们我的世界暂时阴转小雨，甚至电闪雷鸣。

许多病人从入院、治疗、恢复、出院，每一个阶段的状态变更、情绪变化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跟以前的病人相比，现在的病人都很“聪明”：他们有手机，没事的时候会自己百度“对症查症”，“判断”病情，时不时问我关于核酸转阴的专业问题。但在一个基本与外界隔绝封闭的病房里，他们最信任的还是我们医护人员。

治疗过程中，许多病人见不到亲人。此刻，我们就是他们的“亲人”。

我接诊过一位大姐，病症很重，腹痛腹泻，CT也不好。我们不断摸索完善她的诊疗方案，我天天给她打电话询问情况，后来终于好转。病人前几天过来复查，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
“戴医生啊，我在病房天天听到您的声音，却总不知道您长什么样子。今天终于看到您了，这是我十多天以来，最高兴的事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，向我深深鞠了一躬。

今年对我和我的女儿而言，都是特殊的一年。我要面对汹涌的疫情，女儿也要参加高考。

我暂时还没空关心她的学习。在她的“战壕”里，她正在为她的未来而努力；在我的“战壕”里，我正在为一群人的未来，争取胜利的曙光。

说实话，现在我最希望的事情只有一件，就是疫情早点结束。

对我来说，新冠肺炎疫情过去了，还会面对其他各种各样肺炎的病人。作为一名职业医生，我这一辈子会不断和类似场景打交道。很多事情对我而言，只是日常。

## 贴心处

吴杰 | 38岁 | 警察  
整理：王俊祿 | 本报记者  
编辑：刘亮

## 真去隔离，吃的用的谁管？

我没有病，不需要隔离！”“这大过年的，你让我去哪儿？”“集中隔离麻烦不说，万一被感染了谁负责？我不去！”

温州银泰百货的员工戴某，情绪激动地冲我反驳起来。

她说什么也不肯接受集中隔离，我劝一句她顶三句。

已经深夜1点钟了。考虑到病毒传染风险，我们没有进屋，就站在门口劝说她，尽快跟我们去接受隔离观察。

我是温州鹿城区五马派出所的中队长。正月初一下午接到任务：查找一名戴姓女士。她是银泰百货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，需要集中隔离观察。

通过排查找到了戴某的联系方式，先让社区干部对其劝离。戴某在电话中告诉社区干部，身体一切正常，不需要隔离，还谎称自己现在没在市区。

疫情无小事。经过调查发现，此刻戴某人在家中，就租住在本辖区一个小区内。等到了晚上，我和街道、社区工作人员一起，上门劝她主动接受隔离观察，如果坚持不走，就强制带离。

开门后，戴某满脸不高兴。她对我们半夜找到家里来，有些意外。

虽然戴着口罩，我并没有别的专业防护措施。心里有点打鼓，对方情绪激动，大喊大叫，会不会有飞沫跑到我眼睛里？有专家说，飞沫接触黏膜，很容易被感染。想到这里，我本能地退后了两步。

为避免言语冲突，让对方尽快平静下来，我决定改变强硬策略，跟她来点“心理战”。

“潜伏期是感觉不到的，万一感染家里人怎么办？”这时戴某的家人也醒了。我指着她的家人说，“你总得替老公和儿子想想吧。”

她丈夫明白我们的来意后，帮腔说：“你去吧，不就是几天时间。在小区里进进出出，万一传染给邻居不是害人？”

“真要说的话，你让我准备行李物品，那吃的用的，谁管？”戴某看家里人态度有变化，虽然嘴上仍不依不饶，行动上已经开始配合我们了。

劝说用了半个小时，收拾东西又花了20多分钟。好不容易出了门，她又有啥后悔了，竟一屁股坐在社区广场的地上，撒泼喊叫，真是让人头大。

“你别喊了，要是把别人吵醒了，还不说长道短，以后你还不在这里住了？”可能是我这句话比较在理，又是替她着想，戴某这才站起身说：“我不坐你们的车，自己走着去。”

我们怕她再中途变卦，只好陪着她步行。可没走几步，她又想骑电瓶车……就这样反反复复，终于把她送到了隔离观察点安顿。

如此近距离接触1个多小时，说不担心被传染是假的。但没有特别害怕。当时，温州确诊病例数还没有上来。

之后对拒不执行隔离措施的，早就采取强制措施了。如果明知感染还不去隔离，甚至有可能被拘留。

随后几天，温州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多起来，防疫形势越来越严峻。正月初五，我的喉咙突然痛起来，还有点发烧。当时真慌了。我立即和家人紧急隔开，向单位汇报就寝。

##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，温州的广大基层工作者恪尽职守。身处联防联控末端的他们，直面潜在病患，挺身而出——

当时心想，假如真被戴某感染了，那也是躲不开的事儿。就怕传染家里人，两个孩子都小，可千万别“中招”！

我家离疫情集中的银泰百货，直线距离不到100米。这家商场有一位新冠肺炎确诊患者，租住在我们小区。

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原来病毒已离我们如此之近。

好在是虚惊一场，我在医院经过检查化验，白细胞偏高，但排除了新型冠状病毒。又打了三天针，病就痊愈了。

我自己还不放心，在家又自行隔离了几天。单位领导还特意了解戴某的情况，最终确认她未被感染。

说起干我们警察这行，一年到头，越是过节越忙。这次为什么会生病？可能是节前连续值夜班，疫情蔓延后又连续加班，身体免疫力下降了吧。

## 父亲竟没等新房子盖起来

口述：赖玉丹 | 36岁 | 瑜伽教练  
整理：李坤晟 | 本报记者  
编辑：颜文豪

3月3日晚上，接到母亲电话。她哭着说：“你爸爸不行了。”

“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”脑子像一下子炸开，根本不敢相信妈妈的话。

从电话那头的哭诉中，我判断父亲出事了。但下意识安慰自己，一定是母亲急得语无伦次，才说什么“不行了”。

“妈，你千万别急！先打120。我马上回来。”

“120来了。你爸不行了。”

……

母亲的情绪反复不下来。我以最快的速度开车往老家驶去。从乐清市区到垟头村大约20公里，急得我差点追尾。

父亲怎么可能出事？两天前，我刚回去一趟。当时，乐清刚刚结束交通管制。父亲是村里的网格员。村旁边有个小微工业园区。他的工作从之前守住卡口，变为现在给返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登记办证。

那天中午，他回家匆匆吃了点饭，就出门执勤了。现在回想没有什么异样。

去年，我专门带他做了体检。核磁共振、CT、B超、验血……除了慢性胃炎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

平时，我住市区，父母和哥哥在垟头村老家。没想到到垟头前后不到半小时的午饭，竟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。

5分钟后，一名来自贵州的务工人员发现了，随即报警，跑到卡口喊人帮忙。

8点10分，救护车赶到现场时，父亲已经离开了。等母亲给我电话，已近8点半。

我的父亲叫赖小东，1955年出生，是一个平凡的农民。上一辈六姊妹，只有

有一个男丁。

在农村，男丁稀少的家庭往往意味着缺乏劳动力。父亲从小就要去山上捡柴火，帮家里做农活。后来，家里实在困难，他连小学都没有读完，就外出干活补贴家用了。

从种地到开三轮车、开船、开小货车，父亲一辈子换过很多工作。因为没文化，干的全是起早贪黑的体力活。

当年，母亲家里兄弟多，她排行又小，条件好不少。父亲总跟母亲感叹，我想读书没得读。你明明有书读，自己还不愿意读！

前几年，父亲在村里当了一名网格员。同事说，雨大，就别过来了。可他还是披上雨衣出了门。

遇到问题，父亲总先检讨自己做得不够好。我和哥哥从小接受的教育，也是不要占人便宜，遇事息事宁人。

有时候，邻居到家里坐坐，捎来一些好吃的。他总要拿点东西让人家带回去。

我曾想，虽然家里日子清苦些，但父母身体健康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可现在就像刚转个身，父亲就永远离开了。

我最大的遗憾，是他甚至没等到家里的新房子盖起来。

哥哥的婚事是父亲心里的结。在农村，娶媳妇先要建房子。可我们家上次建房子，已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

父亲总觉得，哥哥至今未婚，是他没尽到为人父的责任。他生前心心念念的，就是为家里建一套新房。

听妈妈讲，我两岁的时候，家里的房子被台风刮倒。他们找亲戚东拼西凑，借钱建了房子。

30多年前借钱建的房，预算捉襟见肘，材料能省则省，房子的质量自然称不上好。

小时候，我家被村邻们称作“台湾岛”，意思是孤零零地立在田地边，四周没有邻居。

因为房前屋后没有遮挡，每年刮台风的时候，父亲要用木条将窗户封死。现在我还能清晰回忆起，台风撞击在窗户玻璃上嗡嗡作响。

几年前，我家就成了危房。二楼阳台的栏杆石料早掉了。每逢大雨，屋里就会漏雨渗水。

这些年，为建房子，父母过得很节俭。2018年，我带父母去了一趟横店影视城。这是我唯一一次带他们旅游。平时怎么劝，他们总说要省钱。

去年，父亲终于推倒了老房子。如果没有这场疫情，按照计划，新房应该已经建好了。

这几天，我总在想，哪怕他只是亲眼看见砌好一层，那也好呀！

最后的时光，他和妈妈还住在临时过渡的简易棚屋里。

因为疫情，乐清交通管制。春节之后，我同父亲只见了两面。除了最后那顿饭，正月初八，是他65岁生日。

特殊时期去不了餐馆，也买不到生日蛋糕。那天，我们一家人坐在棚屋里，吃着母亲亲手做的炒面。席间，父亲还提到等疫情结束盖房子的事。

现在，我只希望父亲在那边能过得快活些。不要再担心家里的事。其实，他把我们这个家照顾得很好了。

## 医患间

## 没治好，政府能把我放出来？

口述：杨轩新 | 46岁 | 私企业主  
整理：李坤晟 | 本报记者  
编辑：黄海波

直到转到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，我才知道自己是浙江首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。说起确诊这个事，得从我摔断一根肋骨说起。

5年前，我和爱人来到武汉，做老旧小区电梯加装生意。往年都是临近除夕，我们才回温州。今年读大学的儿子放假早，我和爱人决定提前回家过年。

1月3日，我们从武汉开车出发，直奔老家温州永嘉。路上好像有点受凉。总感觉后背有冷风吹来，当时以为只是普通感冒。

第二天凌晨，到了永嘉县城后，在卫生院打了两点滴。结果不见好转，体温一度烧到39℃。

后来，我洗澡时摔了一跤。感觉胸口这块特别疼。当时并不知道，是肺炎闷出了不气了才晕倒的。

我怀疑是肋骨骨折，就到温州市人民医院拍CT。骨折是真的，但同时查出肺里有阴影。

我有纳闷：过去肺没什么毛病，哪来的阴影呢？难道是……医生听说我从武汉回来，赶紧给我做核酸检测，结果呈阳性。

由于具有传染性，我爱人也被一起收治入院了。

1月17日，我俩都被转到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。一开始我不理解：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转院？每天被穿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围着，看着都吓人。

与他们的交谈中，我才知道自己是浙江省第一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。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，这也是我们被转到六院的原因。

从17日转院到24日出院，治疗刚好一个星期。我和爱人每人一间病房，她在我隔壁。让我欣慰的是，爱人和我一起从武汉自驾回来，一起吃、一起睡，但她的检测结果呈阴性。

更安心的是，目前还没听说我感染了别人。

身体最难受的时候，我以为挺不过去了。现在我自己总结，能顺利康复可能得益于心态好。在医院，我俩自始至终照样吃、照样睡，没有成天去惦记。

当然，也可能是我发病早，不知道疫情这么严重，心里没那么重的负担。

详细的治疗过程，我真说不上来。只记得一边打吊针，一边吃中药西药，应该算是中西医结合。

印象最深的是每天都要吸氧。如果不吸氧，呼吸非常困难，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。

我每天关注疫情新闻，尤其是武汉的消息。当地的朋友听了我的治疗过程，有点羡慕——武汉医疗资源比较紧张，吸氧打吊针都要排队。

在武汉，我住汉阳归元寺附近，和华南海鲜市场隔着一江。我没去过那里，不知道怎么就被感染了。

我出院那天正好是除夕。医院让我回家继续隔离。

我让两个孩子到县城我哥家暂住，我和爱人则回农村老家隔离。

刚出院时，胸口仍有些压抑。居家这段日子，我每天躺在床上测五六次体

## 定点医院的病房是同新冠病毒殊死搏斗的第一线。为战胜病毒，患者和医生齐心协力、相互信任——

镇上卫生部门和六院的医生，每天打电话询问我的恢复情况。

说来好笑，有几天眼睛充血，我打电话问医生。医生说，“手机看多了”。

我挺注意锻炼身体，提高自身免疫力。在家没事干，我就从一楼爬到五楼，再从五楼走到一楼。

亲戚朋友免费送来饭菜，需要什么由村里负责购买。他们都知道我要补身体，经常捎些鸡鸭鱼肉放在门口。

居家隔离满14天。2月8日，我去六院复诊，结果一切正常。

按说该解除隔离了，但农村人还是害怕，我懒得出去讨骂，干脆就安心待在家里。说实在的，眼下到处封闭管理，真想动弹，哪也去不了。

在农村，有些事避免不了。我就知道有人说，“得了病是心肠不好”“没治好找歪门路跑回来”……讲什么怪话的都有。

这些人说话也不过脑子，现在防控有多严，有病住院还能跑回来，那不是害人害己吗？

复诊那天，说好救护车早上8点来接，我6点就起床了，等到9点还没来。打电话一问，车被拦在5个卡口之外，协调不了。

我只好去村里开通行证，自己开车过去。好说歹说过了4个卡口，剩下最后一个关卡，说什么也不让走了。

实在没办法，我只得下车蹭过一条小溪，又走了十几分钟，才上了救护车。

他们也不想嘛，如果没治好，政府能把我放出来？

武汉那面的生意，现在停业压力还能承受。当地员工暂时上不了班，办公场所是我们一个股东的物业。我自己租住的房子，听说现在有政策，房租可以减免两个月。我准备跟房东联系，看看他们什么意思。

如果疫情时间持续长，可能会考虑去其他地方发展。电梯生意哪都能做，靠的是质量和诚信。只是在武汉这几年，各方面关系处得比较顺畅了，到别的地方还要从头再来。

（受访者要求，杨轩新为化名）

## 17个医护围着他“团团转”

口述：戴建议 | 感染科主任  
整理：顾小立 | 本报记者  
编辑：李坤晟

和新冠病毒的“搏斗”，一开始我有点“猝不及防”。1月15日，我到市卫健委开了电视电话会议——虽然早在去年12月，我已看到武汉有不明肺炎消息，但总觉得，千里之遥的温州，即使有疫情，也不会那么快。

1月17日，凌晨5点多，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——领导通知，温州可能出现病例，马上来医院。

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，匆匆洗了把脸出门。到了医院我才知道，病人